

◀ (上接 4 版)

史料检索时代之前如何进行制度史研究

赵:下面,请教您个人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方面的问题。您是从制度史这样的研究路径来研究北魏的。那么,在使用北朝史料时,与社会史等其他研究路径相比,制度史研究有怎样的特征呢?可否请您谈谈感想?

窪添:我年轻的时候正是社会经济史全盛时期,自己完全缺乏投身其中的勇气。《魏书》是以族谱型风格写成的,关于单个人物的记载量较少。我以为作为史料来处理受到一定限制,也就是需要以批量化处理为中心。就我的个人研究来说,喜欢使用表格是特点之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在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虽然也觉得这样并不一定就好。

赵:《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收录的很多大作都需要极为繁杂琐碎的史料整理工作。在得出结论之前,需花费极大的功夫。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还是没有数据库能够进行史料检索的时代,必定更为辛苦。那么,您的研究工作一般是如何入手的呢?

窪添:早在硕士论文写作阶段,我就已经对《魏书》列传记载的所有人物,制作整理了记录他们每个人所任官职的卡片。只要是关于人物和官职方面,一翻卡片,马上就能找到资料。现在又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墓志的数据进行优化,还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作用呢。

赵:先生早期主要利用文献史料来研究官僚制度,例如可以举出尚书省和赠官等方面的研究。近年则关注新出土的大量墓志,结合石刻资料和文献史料开展新研究。对于后学来说这是十分宝贵的经验,可否请您谈谈感想?

窪添:对墓志的关注应该说从本科毕业论文时代就开始了。但真正的研究、利用墓志大概是从十年前开始的。当时恰好伊藤敏雄兄作为代表申请的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课题得以通过,主题就是利用出土资料研究历史。我作为课题组成员负责墓志方面。我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孝文帝迁都以后墓志在北魏迅速普及,这是为什么呢?这就需要对墓志开始出现以来的发展演变进行把握。此时恰好应该使用清晰显示数据的研究方法。如此考量后,我采取的方法是将定型化完成阶段的墓志的构成要素一一抽出,然后



窪添慶文《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赵立新、涂宗呈、胡云薇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在全部阶段的所有墓志中对这些要素的有无进行考察。由此第一次认识到,包括自己在内,过去对墓志的利用都是有些机会主义性的,只是摘出有用的片段加以利用。真正的墓志研究,应该是对一方墓志构成的整体把握为基础的。但墓志的文辞本就难解,加上墓志数量众多,确实说易行难。但即使不能对墓志文辞做全面解读,还是要能够大体把握其内容才好。

墓志也存在许多因各种原因而隐讳不书的情况,完全相信肯定也是有问题的。我想需要以正史和墓志双方都有记载的事例为中心,才能够对北魏的官僚制进行深入讨论。

利用墓志的研究最近多起来了。例如侯旭东兄利用申洪之墓志讨论北魏部族解散的论文就非常精彩。不过,我并不偏好仅以一方墓志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还是喜欢利用很多墓志来进行考察。这大概还是缘于从青年时代就习惯了的研究手法吧。

赵:您以北魏官僚制度为中心展开研究。官僚制度的改造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您看来,北魏王朝从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过程中,官僚制度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又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呢?

窪添:北魏前期的统治并未采取将最末端的乡村都严格掌控的体制。中央层面虽然设置了中国式的官僚制度,但体制上是以掌握官僚上层为主,并通过内朝官进行控制。然而,随着支配领域渐广,将末端的乡村也纳入统治、从农民那里征收租税和兵力也就势在必行了。因此就有必要对官僚制进行更为深入的整備。另外也有必要摆脱容易抵制改革的胡族上层的制约。这就导致了孝文帝的官僚制度改革。虽然这只是孝文帝改革的一环,但应该是改革的核心部分。

孝文帝的官僚制度改革中,在设定散官性官职、系统性晋升官僚地位、重视考课等方面,与唐代官僚制关系密切,应

当给予高度评价。隋唐渊源在何方是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就官僚制而言可以说是渊源于北魏的。

关于孝文帝时期官僚制的研究,与墓志相关研究一起,都收入了今年9月底出版的拙著《墓誌を用いた北魏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具体看法请参考拙著所论。

赵:先生长年从事北魏史研究。北魏诞生于内亚与中国王朝之间。那么,在中国史乃至欧亚史中北魏具有何种历史意义呢?另外,也希望听听您对北魏和北朝史研究的展望。

窪添:北魏诞生于农业与畜牧交接地域,运用具有游牧民特质的骑马军团的强大军力实现了对华北的支配。但是,仅靠这个是无法进行统治的,故又将汉族吸收进了支配阶层。所以,北魏既吸收了汉族的王朝制度,鲜卑族的固有制度也多有保存。孝文帝的所谓汉化政策给北魏带来极大变化,但并非都变为了汉式的东西。有许多制度外面看起来似乎是汉式的,但其实保留了胡族性要素。又如均田制和三长制虽然都是基于中国古典而被提议的,但这些制度在南朝是否能产生呢?大概还是不行的。这一方面有时代状况的变化作为背景,即北魏需要将汉族纳入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北魏支配权力的强大也让均田制、三长制的成立成为可能。当要解决遇到的问题时,不能只考虑自己一方的情况。调查各种条件之后选择认为最优的道路,这是任何政权都会去做的事情。不仅北魏如此,各个非汉族、非农业民的政权所进行的探索,让秦汉以来的历史样态发生了许多变化,最终走向了隋唐时代。这虽然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却是我的一己之见。

关于今后的研究展望,还没怎么考虑过。现在计划处理一些新著中留下的问题,都比较琐碎。以后的话,颇为担忧好像已经没有继续用此前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问题的能力了。本

来应该探讨的是,孝文帝改革所指向的目标在北朝后期是如何变化的,又是如何走向隋唐时代的。但也只能留待年轻人去讨论了。如果有继承我的看法的人的话。

日本学者从事中国史研究的意义

赵:作为一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您认为要取得理想的研究成果,平时需要保持怎样的心态?对您来说,中国史是怎样的存在?可否谈谈您今后的研究计划?

窪添:恩师西嶋先生是理论构筑和实证能力兼备的。我想这是最理想的。应该保持对中国史整体的关心,也需要关注历史理论问题。虽然我自己似乎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作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史的意义何在?我的回答是为了理解日本历史。当然这是“标准”答案。实际上还是从兴趣出发的。另外作为东洋文库研究班的一员,在各位成员的一起努力之下,还想继续推进《水经注疏》的译注工作。

赵:您觉得历史学研究妙趣何在?可否对有志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年轻人略谈一二?

窪添:发掘出新的历史事实,或者描摹出新的历史像,我想历史学研究的快乐就在这里。我自己是在完成硕士论文的时候第一次切实感受到了历史研究的有趣之处。因为之前只是在学习已成定论的历史,或者学习研究者描述的历史像。我的研究仅有的特色,就在于绵密地追求史料低语之处。当这种追求有所收获时所感到的喜悦,正是研究的目的所在吧。

赵:因学术交流的缘故,您有很多出席中国的学会,和中国大陆、台湾的先生们交流的经验。可否谈谈您比较有印象的事情?

窪添: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8年,但此后一段时间内没有机会见到研究者诸先生。所以对1992年在西安召开的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与年龄相近的几位先生当场就有亲切交流。而与似为教授级别的先生们就只是合了影,回日本后才整理到相册中,将姓名和相貌对应起来。

2001年,我作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教授在中国停留了一年。从而有机会到诸先生的研究室和府上拜访。与周一良教授、田余庆教授都有过私人性的谈话,还在童超先生府上品尝过他太太的手作料理。印象特别深的是去拜访何兹

全教授。虽然他已是90岁高龄,但当我在约定时间登门时,发现还有几位学生模样的客人在。当听说他们是在进行研究生院的学生选考时,我大吃一惊。虽听说何教授精神矍铄且记忆力完全没有衰退,但没想到居然还能现场指导研究生。顿感自己的研究能力之衰退,要是能有何先生百分之一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了。

与台湾诸先生的交流很早就开始了。郑钦仁、黄耀能、高明士诸教授在日本留学时,我还是比他们都要年轻的研究生。不只是上课和研究会上常见面,也有不少个人交往。特别是郑钦仁教授,我们都是以北魏官僚制为研究对象的。曾经拜访过他留学时代的宿舍,看到郑教授整理的大量卡片,大受刺激。尽管是突然造访,郑教授太太还是很快包了饺子招待我。不是日本常见的那种日式煎饺,而是地道的中国饺子,那种美味今天还能记得呢。

赵: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在宏富的研究之外,您也曾经到中国长沙和大同等地进行学术调查,应该很辛苦吧。可否略谈一下印象较深的经历?

窪添:这方面我从没有自己做过计划,每次都是跟着别人一起参加调查而已,实在不足道。

主要参加过三方面的调查。首先是因东洋文库研究员成员推进的《水经注疏》译注工作而进行的实地调查。至今已经对渭水、洛水和伊水进行过调查。虽然也包括对遗迹的调查,但因为是河川流域,有不少地方都是人迹罕至之处,吃饭时间也经常推迟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在渭水流域调查时,有一天临近傍晚好不容易才到了旅馆所在的街区入口,结果因为道路施工没法进去,只得又返回半路,开车越过因枯水期水量大减的河道。

其次是长沙走马楼吴简的调查。主要是去简牍博物馆以及博物馆建成之前的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调查,对指定的竹木简进行测量、摄影、对照释文、确认编缀痕等工作。虽然不一定得到期待的结果,但收获也不小,特别是真切感受到了简牍研究中必须直面实物。当然我们也了解因为相关的简牍很多,要看到全部实物也是不现实的。

最后是在大同、洛阳、郾城等地进行的石刻相关调查。我们得到了当地相关部门的热情接待。甚至有时因为改造而闭馆,却又为了我们将已经打包的文物再度解开。特别难忘的是大同大学的殷宪教授,在府上招待我们,让我们有机会亲手接触他的收藏品。

(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译,钱静怡校)